



莫斯科商人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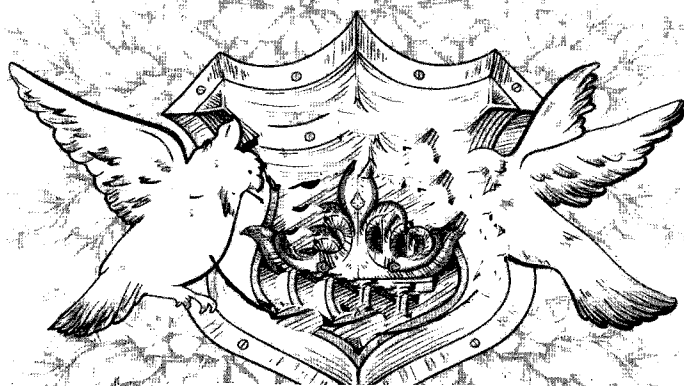
[俄]

译

東方出版社

莫斯科商人秘史

[俄] 布雷什金 著 谷兴亚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商人秘史/(俄罗斯)布雷什金 著;谷兴亚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60-4365-6

I. ①莫… II. ①布…②谷 III. ①商业史-史料-俄罗斯 IV. ①F73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0022 号

莫斯科商人秘史

MOSIKE SHANGREN MISHI

(俄罗斯)布雷什金 著 谷兴亚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4365-6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百年不肯疏荣辱 ——读《莫斯科商人》

(代译序)

谷兴亚

莫斯科商人，莫斯科商人，
缺尺少寸昧良心，
你算哪门子祖国之子呀，
你简直就是……狗崽子！

这是茨冈人（即吉普赛人）唱的一首挖苦嘲骂莫斯科商人的歌。茨冈人当时四海为家，漂泊世界。就连他们也攻击莫斯科商人，可见莫斯科商人之臭名远扬举世皆知了。

这首歌引自 1954 年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书——《莫斯科商人》，作者帕·阿·布雷什金（1887 — 1953；另说 1955）是俄国著名的“阿·瓦·布雷什金公司”的董事长之一、《俄罗斯晨报》的董事、多家银行的理事、全俄罗斯工商联合会委员。十月革命前为莫斯科市副市长。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几次要任命他为政府部长，他均婉言谢绝，足见他当时在工商界、金融界、乃至政界是颇有影响的人物。1918 年夏，在得知自己已被布尔什维克列入黑名单之后，他离开了俄罗斯。后来他自伦敦潜回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参加高尔察克军政府，先后任财政部长等要职。1920 年 1 月逃到我国的哈尔滨。后又经日本到达美国、英国。以后长期居住在法国，参加过俄国侨民的各种组织，曾在多所侨民学校任

教，并创建了古莫斯科博物馆。作者是 20 世纪最初 20 年俄罗斯动荡社会生活的见证人，是自 1905 年起、特别是 1912—1918 年间莫斯科工商业界重大事件的实际参与者。

这本书首先是回忆录，也可以作为俄国商业资本乃至工商业资本的发展简史和文化史札记来阅读。该书出版后，近 40 年间在苏联一直被列为禁书或特藏书。为什么呢？作者在书中并未批评苏联政府，也未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不过是苦涩而沉痛地回忆了俄罗斯工商业界人士艰难而凄楚的命运，分析其原因，讲述了许多许多的实业家族如何艰苦创业，在祖国的文化领域与慈善事业上作出了那些贡献，又如何遭遇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攻讦。当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反驳了莫斯科商业界是“黑暗王国”的责难。这就犯了大忌。

1991 年该书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全书共五章。在前言中，作者分析了对俄罗斯实业界的恶劣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他认为，丑化俄国商人首先是从外国商人与旅游者开始的。他们在各式各样的旅俄札记中大肆渲染俄国商人的奸诈、狡猾，似乎俄国商人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其实，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俄国商人与其他国家的商人并无多大区别。买卖双方都力求获得最大利润，诚信与否往往是双向的。

作者认为，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就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俄国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重农轻商可说是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传统国策。上层统治阶级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把贵族农奴主视为国家的支柱，而商人只不过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商人作为普通市民没有任何权利，其子弟甚至不能进入大学学习。商人则力争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军界，晋升为贵族，而耻于让他们继承父兄的事业。俄国斯拉夫派更是从理论上、哲学上美化俄国农村，贬斥商人。这种情况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得以缓慢改变。

布雷什金认为，俄国商人为社会所诟病的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学宣扬的片



面与极端的理念。他指出，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大多数对商人都持否定与排斥的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与作家更是把此观点推向极致。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他先后提及克雷洛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的确，并非所有大作家都描写过商人的生活，但只要一涉及，就几乎总是让商人以骗子、滑头的面孔出现。一直到上世纪（即19世纪）末，作家笔下的商人们似乎还都认为欺骗是生意往来中的正常方式。他们压迫自己的亲属和雇员，强调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钱。作家们所写的实业界人士中几乎没有正面人物形象，即便有也不成功。”比如，克雷洛夫。他有一篇寓言，题目就叫《商人》。老板教训自己的侄子怎样才能赚钱：“照我这样做生意，保你利润高！/波兰呢子那块料，想必你知道，/在这摆了那么久，总也卖不掉，/呢子浸过水，颜色又旧料又糟，/让我冒充英国货，转眼脱手了。”结果，被骗的却是老板本人，因为顾客给他的是一张假币。这篇寓言的结尾说：“被骗，骗人，/毫不稀奇！/……看谁能把谁骗倒。/谁更狡猾，谁占便宜。”果戈理谈及商人的笔墨不多，也没有成功的正面形象。在剧本《婚事》中，在阿加菲娅·季洪诺夫娜的未婚夫当中，“客商”阿列克赛·斯塔里科夫的形象相当苍白，没有任何可称作典型的东西。

在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中，写商人生活的剧本占的分量最重。奥氏在俄国戏剧发展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布雷什金对奥氏也给予充分的评价。问题在于杜勃罗留波夫，他是将工商界称作“黑暗王国”的始作俑者。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文学批评的高峰出现于1859年，以发表《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为标志。正面评论奥氏剧作的两篇文章《黑暗王国》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分别发表于1859与1860年。这两篇文章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一方面，他高度评价剧作家已经创作完成的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奥氏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杜氏的“现实的批评”由此取得了在文学批评中的话语



权，在奥氏戏剧的评论中确立了垄断地位。莫斯科商人生活圈子是黑暗王国，商人是黑暗王国的代表，这几乎成了定评。这个结论在当时为俄国知识界广泛接受，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这正是让布雷什金耿耿一生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于悲哀而低声叹息的隐藏的世界，这是一个由于疼痛而呻吟的迟钝的世界，这是一个像监狱里、棺材里一样寂静的世界，只有偶然才有一种低沉无力的、刚一产生立刻又告衰竭死灭的喁语渲染一点活气。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空间；这种黑暗而拥挤的牢狱正在散发着腐朽而潮湿的气息。没有一个声音从自由的空气中传进来，明亮的白天也没有一道光穿透到它的里面。在这里，只有偶然才会迸发出一种暂时还没有被俗世生活的泥污堆所压灭的、还在人们胸膛中燃烧的神圣火焰的火花。这种火花在这监狱里的潮湿与恶臭中，只是微微地冒着烟，但有的时候，在一刹那之间，它也会勃然发作，用真理与善良之光，沐浴着这些困顿衰疲的囚徒们的黝暗的躯体。凭借这一刹那之间照耀的帮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兄弟们正在这里受苦，看见了在这些鄙野、沉默、污秽的生灵中，可以辨认出人类面貌的轮廓，于是我们的心就因为疼痛和恐怖而蜷缩。这些不幸的囚徒，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昏昏沉沉地坐着，甚至连自己的铁链都不去抖动一下；他们几乎失去了认识自己的悲苦地位的能力；但至少他们还能感觉到压在他们身上的重量，还没有丧失感觉到自己的疼痛的能力。如果他们沉默不语地、一动不动地承受着这种疼痛，那么这是因为在这种奇臭的深渊里，每一声叫喊，每一次叹息，都会使他们的喉咙窒息，使他们的胸部感到刺人的疼痛，被锁链所捆绑的身体的每一种动作，都在威胁他们这要使压力加重，这要使他们痛苦受折磨的状况加深。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盼望欢乐，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寻找慰藉。一种毫无意义的专横顽固，粗暴而蛮横地统治在他们的头上……”（《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第95—96页）

布雷什金引用的这一大段杜勃罗留波夫的名言充满了对黑暗势力的愤怒控诉



与同情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都能获准上演，杜氏的火辣辣的评论，包括随后出现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文章，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呼应下产生了海啸般的力量，引起了广泛共鸣。布雷什金指出，虽然后来有其他作家发表过从正面反映商业资本家的小说，如博博雷金的《中国城》，梅里尼科夫—佩切尔斯基的《在林中》与《在深山》；有评论家写出了观点不同的论文，如格里戈里耶夫的《〈雷雨〉之后》，——最终都未能消除“黑暗王国”论的巨大影响。

布雷什金说，其实，杜氏关于黑暗王国的概括既不符合剧作家的本意，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奥斯特洛夫斯基首先是一位风俗画家，他力图公正地描绘出那个时代各阶层的生活状况，而并非专门致力于揭露讽刺“黑暗王国”——俄国的商人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陆续问世，这个观点也逐渐在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界为一些人所接受。而剧作家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创作，其中也包括《自家人好算帐》，是对商人的揭露与讽刺。他在给纳季莫夫的信中说：他的未完成的剧本（指《自家人好算帐》）获得了广泛的好感，“一些优秀的商人家族都明确表示愿意看到我的喜剧的出版与上演。我本人几次在由莫斯科商人组成的社交场合中朗诵这个喜剧，感谢俄罗斯人爱好正义的天性，他们不仅不感到受了这个剧本的侮辱，还真诚地向我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认为剧本中真实地再现了他们这个阶层的现实的缺点与罪过，并热烈地表示，为了本阶层的利益，必须切实地正确地揭露这些罪过，特别是错误的教育。”布雷什金认为，在《自家人好算帐》的末尾，引起人们怜悯与同情的是“专横顽固”的老人，而不是年轻的造反者。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剧作家的遗产就会发现确实如此。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创作了47个剧本，其中有悲剧、喜剧、正剧、历史剧，塑造了700多个人物，反映了俄国三百来年的社会生活，特别是19世纪40至70年代的社会现实，展现了俄国人民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刻画黑暗、愚昧、保守、残忍的商人



只是剧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个方面。在一些剧本，如《各守本分》中，剧作家的同情毫无疑问是在“黑暗王国”的代表人物卢萨科夫与万尼亚·博洛德金一边的。在《来得容易去得快》和《狼与羊》中则塑造了新型企业家瓦西里科夫与别尔库托夫的形象，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西欧的社会制度，轻易地就能战胜腐朽没落的贵族，是新一代“获利的英雄”。

布雷什金认为，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中得出结论——商人阶层是黑暗王国，这不是剧作家的过错，而是杜勃罗留波夫的过错。他说：“当然，在这个王国里有时也确实能遇到‘卡巴尼哈’式的人物，然而，在其他阶层也能遇到‘萨尔蒂奇哈’式的人物，不知道她们哪个更坏些。”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卡巴尼哈”，熟悉俄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是《大雷雨》中的女商人卡巴诺娃的绰号，意思是母野猪，暗指她蒙昧、粗暴、残忍。而知道“萨尔蒂奇哈”的人就不多了。这里说的是俄国18世纪萨拉托夫省的一位女地主兼农奴主萨尔蒂科娃。她因过分恶毒地虐待农奴而名噪一时。她为了取乐，甚至让怀孕的女农奴给她的儿子当马骑，让男农奴脱光衣服在冰上为她跳舞。她虽然罪大恶极，但因为贵族有法定的特权，却不能对她做任何惩处，只能当着她的面，用鞭子抽打其他罪犯，——用罪犯凄厉的哀叫声来威吓萨尔蒂科娃的恶毒的心。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也许现在觉得滑稽，但在当时却符合法律。法律规定，农奴主有权买卖、责罚农奴，发配他们去充军。虽然不允许杀死农奴，但实际上法院只审理老爷亲手直接杀死农奴的案件。因此，即使农奴被折磨致死，地主也永远有理，有罪的充其量只能是执行农奴主意图的人。由于不少俄国知识分子对农奴主贵族情有独钟，农奴主的残暴在文学中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就连以反农奴制著称的屠格涅夫，在其《猎人笔记》和《木木》中，表现的也明显是经过淡化或稀释了的残酷现实。诚然，如果刻画十足真实的生活场景，沙皇政府也不允许发表。

布雷什金似乎在无意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历史地看待19世纪



前半期的俄国商人。俄国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大踏步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在此之前俄国的商业经济已经有了多年的发展。商业资本产生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本身自然带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印记。许多商人本身就是农奴主，或者是正在摆脱农奴地位的市民。商人身上的野蛮习性实际上是农奴制度的遗风。商人又往往兼营手工业生产，因此，“莫斯科商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指的是商人与工厂主，即我们常说的实业界。我国称之为工商业界，俄语中却习惯于称作“商工业界”，把商业放在工业的前边。也许，这更能体现商业是工业的长兄。商业为早期的工业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奴隶制社会再残暴，买卖奴隶，有时还任意杀死奴隶，但毕竟比原始社会前进了一步。这是社会发展史里的常识。同样，从理论上讲，商业资本家总比地主农奴主更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卡巴尼哈混迹其间的早期商人或商业资本家总要比萨尔蒂奇哈们好一些。但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如现在俄国国内使用的最新中学文学课本中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些“激进分子”，他们不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而寄希望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即村社，幻想由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历史业已证明此路不通。

不过，公正地讲，对奥氏戏剧的误解也不能全怪杜勃罗留波夫。杜氏死于 1861 年，奥氏的戏剧创作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杜氏评论涉及的奥氏剧本共十来个，《大雷雨》为最后一个，在剧作家的全部 47 个剧本中按时间先后则是第十四个。也就是说，杜氏见到的仅仅是剧作家的早中期作品。把“黑暗王国”论概括为剧作家全部创作的精髓主要是后人干的事情，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斯大林极权统治极力鼓吹的结果。

布雷什金以他十分熟悉的莫斯科商人的实际状况反驳关于“黑暗王国”的责难。在这本书中主要介绍了莫罗佐夫、巴赫鲁申、特列季亚科夫等 28 个商人家族的谱系与历史，他们经营活动的范围，特别是他们的文化投资与慈善活动。这



些家族发家的时间有前后，持续的时间有长短，从事的活动范围也有区别，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的事业仅仅是赚钱，而是有一种义务感，即完成上帝或命运赋予自己的使命；他们没有欧美国家人们对致富的崇拜；他们不太贪婪，对欠债人宽容，习惯于自由支配自己的遗产，而不一定遗赠给子女；他们热衷于慈善事业，热衷于收藏和投资文化或公共福利事业。

布雷什金首先介绍的是莫罗佐夫家族。这个家族的奠基人是萨瓦·瓦西里耶维奇·莫罗佐夫，他的事业开始于19世纪初叶，在莫斯科大火之后。萨瓦·瓦西里耶维奇有五个儿子，即：季莫费伊、叶里谢伊、扎哈尔、阿布拉姆和伊万。他最小的儿子伊万的命运人们知之不多，其余四个儿子本人或者其后代分别是四个主要的莫罗佐夫纺织工厂的奠基人，莫罗佐夫家族四个分支的创始人。长子季莫费·萨弗维奇在开创文化事业上花费过巨资，其中包括出版业。季莫费有两个儿子，萨瓦与谢尔盖。小儿子谢尔盖创建了莫斯科手工艺艺术博物馆，在手工艺艺术的发展上做出了贡献。值得格外重视的是萨瓦·季莫费叶维奇。他担任自己的纺织厂厂长多年，熟悉工厂事务，还经常从事社会上的与工业界的活动。他的兴趣极为广泛。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发展上发挥过巨大作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我的艺术生活》中专门有一节写莫罗佐夫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尽管剧院有了艺术成就，但在物质方面却并不能令人满意。亏损与日俱增。储备金已经枯竭。必须召开一次股东会议，请他们再增加一些投资。遗憾的是，大部分股东拿不出钱来。他们虽然热望帮助剧院，却是爱莫能助。事业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刻。但是，这一次好运又照顾了我们，先期为我们准备了一位救星……还在剧院刚刚成立的那年，萨瓦·季莫费耶维奇·莫罗佐夫有一次偶然来看我们演出的《沙皇费多尔》。这位著名的人物注定要在我们的剧院里扮演重要而光荣的保护人的角色，他不仅能为艺术承担物质的牺牲，而且能够忠诚地、无私地、毫无野心地、不计个人利益地为艺术服务……谁也没有想到，他忽然出席了上述的股东



会，并且要求把全部股票都卖给他。股东们同意了，从那时起，莫罗佐夫，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我三个人就成了剧院的仅有的主人了。莫罗佐夫供给剧院资金，负责全部经营管理工作。他深入钻研业务，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全用在这方面。”他很快投资建造了新剧场，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舞台设备。等剧院开始盈利以后，他又主动放弃自己的股权，使剧院的一批核心演员成了剧院的所有者。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莫罗佐夫“明白资本主义在广阔的国家范围内的力量。”丹钦科谈到萨瓦·莫罗佐夫如何全力支持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事业，后来又如何热衷于支持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最后又大力支持革命运动。布雷什金说，当时莫罗佐夫出巨资大力赞助在莫斯科的革命党人的活动。1905年爆发了第一次大革命，随后就开始了残酷的镇压。大概莫罗佐夫心理上出了一些问题，他在法国的尼斯开枪自杀了。

莫罗佐夫家族创建了许多慈善机构，其中包括多家大学医院。最著名的是附属于莫斯科大学的肿瘤教学医院。里亚布申斯基说，这家教学医院简直就是一座城市。另外还有多家大学的心理医院以及儿童医院、产科医院、养老院。

书中介绍的第二个家族是巴赫鲁申家族。“这个家族的血液里有两个特性，就是收藏与行善。”在收藏活动中著名的是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巴赫鲁申。前者收藏俄罗斯文物，主要是古版书。遵照他的遗嘱，他的藏书捐给了鲁缅采夫博物馆。他收藏的瓷器与其他古董则捐给了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厅。人们传说，他吝啬得吓人，因为“每逢礼拜日他便到苏哈列夫卡市场去，像犹太佬那样讨价还价。”关于阿·亚·巴赫鲁申的戏剧博物馆“无须赘言，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全世界与戏剧有关的物品的最详尽的收藏。对此苏联大百科全书列有词条。在莫斯科，巴赫鲁申家族有时被称作职业慈善家。他们有一个传统：每逢年终岁尾，如果这年在财政上还顺利，就要拨出一定资金投入慈善事业。在老一代巴赫鲁申生前就已经建



成并经营巴赫鲁申城市医院、免费住宅、无家可归者收养院、男童手工艺学校、老年演员公寓等。

特列季亚科夫家族是一个古老但并非异常富有的商人世家。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两兄弟继承父辈的事业，先经营商业，后又扩充至工业领域，主要是从事亚麻的纺织与销售，事业相当成功，但该家族从未上升到最大的富豪行列。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从事其他领域的活动。业绩之一就是创建莫斯科聋哑人学校。此外，谢尔盖还积极参与与市政管理的工作，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帕维尔则倾全力于美术作品的收藏。两兄弟都是收藏家，但谢尔盖像是位业余收藏家，帕维尔则视此项活动是上帝赋予自己的天职。关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有一整套文献，有不少专著。帕·米·特列季亚科夫在写给莫斯科市杜马的声明中说，他“把自己的与已故弟弟的画廊捐赠给莫斯科，是希望完善我所钟爱的城市的有益机构的设备，促进俄罗斯艺术的繁荣，也为了使我的收藏品得以永久妥善的保管。”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希望捐赠仪式静悄悄地进行，避免不必要的张扬，他不想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和感激的对象。这一点他未能如愿，并曾经很不满意。特列季亚科夫美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把二十几个家族一一介绍。但最后还应当说一说作者所属的布雷什金家族。布雷什金说，他祖父曾是农奴，他父亲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1853 年出生，1912 年去世。父亲 11 岁时随其表兄徒步来到莫斯科，从市民学校毕业后开始当店员。靠自己的打拼，逐渐积累了一份家业，1904 年创建“阿·瓦·布雷什金纺织品公司”，流通资金约为 1500—1800 万卢布，成为当时莫斯科的二等资本家。作者自嘲地说，他们家过的是“黑暗王国”余孽的生活。他们生活俭朴，看不到任何奢华的迹象。家庭和睦，成员间互相尊重，孩子们享有高度的自由。午餐全家在一起吃，比较丰盛，但从来没有葡萄酒，烈性白酒更是想都不能想。就餐时经常谈的是戏剧，也谈音乐，谈文学。谈政治的时候比较



少，因为大家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作者的一位姐姐有强烈的民粹派观点，她不想挑起争论。父亲虽然学历低，天赋却很高。通过不断的阅读与自学，父亲成了一位很有教养的知识渊博的人，熟知黑格尔与叔本华的著作，在莫斯科的工商界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父亲死时留下遗嘱，要求把指定数额的钱分赠给公司所有的职员，每人一份。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为了不让企业伤筋动骨，他的遗属卖掉几座庄园来执行遗嘱。父亲还决定将在莫斯科的一幢房子遗赠给莫斯科市，用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或图书馆。由于爆发战争，以及后来的种种事变，父亲的遗愿未能实现。不过，这个家庭在慈善事业上还是有作为的。在父亲的公司里有一张工作台，是专门搞慈善事业使用的。但这些事都是默默地做，甚至有许多事作者都不知道。“前不久我得知关于父亲的一个笑话。资助贫困大学生委员会的代表找到父亲，向他推销委员会组织的义演剧票。最贵的票一百卢布一张。父亲拒绝了，说是太贵。他们又建议他买二十五卢布的，十卢布的，父亲还是说太贵，只要了一张两个卢布的，然后又补充说：‘大学生的事你们不必焦虑，早晨我已经为他们送去了一张两万五千卢布的支票。在剧院里嘛，我站着看戏也行。’作为从底层走出来的人，他主要得益于学习。”因此他特别关心穷学生。具备条件之后，布雷什金家资助过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后来学有所成的名人。

读完《莫斯科商人》，读者自然会发现俄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与欧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别。譬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俄国文学不可能允许安东尼奥这样正面的商人形象出现。为什么？《威尼斯商人》创作于16世纪末，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这一点与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创作时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大致相似。当时资产阶级无疑代表着新兴的势力与新兴的生产力。至今我还未曾读到过对莎翁的商人形象是否真实的探讨。人们对莎剧的成就，学习、借鉴、欣赏还唯恐不及，更遑论挑剔指责这类玉里求瑕的勾当



了。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命运则截然不同。因为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批评家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理想，否定俄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俄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相继续过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使得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论一直垄断了文艺论坛。

在 20 世纪，我国的俄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长期处于苏联文学理论影响之下，直到今天仍难以摆脱。“黑暗王国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洋提法，这种非黑即白、黑绝对黑白绝对白的极端观点应该予以破除。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重新认识俄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特别是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的《烟》和《处女地》等作品的重新评价。这是无法回避的。

布雷什金在《莫斯科商人》中力求做到客观，冷静，公正。但他毕竟是活跃在 20 世纪之初的工商业界人士，他的叙事论事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有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这当然是我们今日中国的读者所应该注意的。

（本文发表于《随笔》杂志 2010 年第四期）



作者的话

这本书首先是我的回忆录。我是莫斯科工商业在最重要的岁月，即从1912年至1918年间生活的见证人与亲历者。我作为见证人的时间还要早，根据我的记忆，实际上从1904年起，我已经能够系统地观察莫斯科的社会生活，并充当了我父亲在社会事务上的秘书的角色。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对社会活动感兴趣；可以说，在认真浏览父亲的文件材料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培养，而父亲收到的文件材料相当多，这有助于提高我步入社会生活时的素质。

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月革命的年代称作“最重要的”岁月。对莫斯科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岁月，尤其是二月革命时期，这是他们的社会活动格外活跃的时期，他们无疑为事件的进程与结局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因此，我觉得，我的叙述突破自己“亲眼目睹”的框框是合情合理的。为了真正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而不是那种事，需要懂得历史，需要懂得莫斯科工商界的生活形成于其间的那种环境。为了判断，为什么这些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成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头面人物，就需要知道它的“人员构成”。关于这一切，暂时尚无任何全面论述的著作，然而却有相当多的资料，甚至在国外，这种资料也不胜枚举。当然，总还缺少些什么，不过，在巴黎有许多珍贵的俄语藏书，是可以用于工作的。

我想，由我来撰写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已经所剩无几，全都是老人。我66岁，而我还是最年轻者之一。

还应当补充的是，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向往写一部莫斯科商人的历史。第一位



建议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亚·阿·马努伊洛夫^①，我的经济学老师。亚·亚·基泽韦捷尔^②也多次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曾同他一起准备筹办出版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的纪念文集。我于是着手准备：搜集有关莫斯科史与俄罗斯商业史的资料。关于莫斯科史我已经搜集到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据说，后来它成了莫斯科市博物馆的基础展品。莫斯科市博物馆有一个时期在位于特维尔大街上英国俱乐部的房间里。在我的收藏品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

在我的亲人挚友中，一贯督促我写这本书的是我的女儿，所以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① 亚·阿·马努伊洛夫（1861—1929），俄国经济学家，1908—1911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② 亚·亚·基泽韦捷尔（1866—1933），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09—1911）。